

“边际人”心态及其影响因素^{*}

——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的实证研究

唐利平

【摘要】 文章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了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的“边际人”心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中普遍存在着“边际人”心态。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移民“边际人”心态的主要因素有:社会交往、生产劳动方式和日常生活适应程度、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外出打工经历、家庭经济收入满意度以及年龄等。

【关键词】 “边际人”心态 三峡农村移民 跨省外迁

【作者】 唐利平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三峡水利工程引发了百万三峡大移民。“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是三峡移民工作的最终目标,三峡移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移民在安置地的适应和融合问题。按照安置地的远近,可将这些移民粗略分为“近迁”(库区内就地后靠安置)和“远迁”(跨省外迁安置)两大类。由于迁出地与迁入地在自然环境、经济、文化习俗和语言等方面并没有明显差异,库区内就地后靠安置的“近迁”移民与迁入地的融合相对容易,因此就地后靠安置是国家安置三峡移民的主要方式。

然而,由于库区安置容量有限,1999 年国家对三峡移民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加大外迁移民力度,重庆库区内有 7 万三峡农村移民成建制地外迁到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 11 个省市。与“近迁”移民相比,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的“迁移”特征更加突出。不仅迁移距离远,安置模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一个村几十户的“集中安置”转变为一个村两三户的“分散安置”),而且迁出地和迁入地在自然环境、经济、文化习俗和语言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也就是说,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不仅经历了地理上的迁移,而且还要经历社会文化的变迁。这种经历和体验无疑赋予了他们产生“边际人”心态^①的前提和背景。那么,三峡农村跨省外移民是否具有“边际人”心态?哪些因素会对这种心态产生影响呢?本文通过对迁入江苏省内三

^{*} 本文为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的社会适应”的部分研究成果。

^① “边际人”,是指处于社会或文化边际或边缘位置的人。这部分人往往会在社会文化变迁或地理迁徙过程中产生一种特殊的转型心态,这种心态也就相应的被称为“边际人”心态。早在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将具有这种心态的人称为“异乡人”(Kurt Wolff, 1950:402~408)。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 1928:881~893)将“边际人”形象地比作“文化上的混血儿”,即曾经生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文化群体里,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边缘位置,没有被充分整合到主流社会中去。

峡农村移民的抽样调查,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力图找出其中的理论含义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

(一) 抽样方法

从 2000 年开始,先后有 7000 多名三峡农村移民迁入江苏省射阳、东台、如东和大丰 4 个县市。由于对这些移民的安置采取“集中到县、乡,分散到村、组”的方式,一个村大约安置 3 户左右的移民家庭,加之苏北农村幅员广阔,交通不大方便,所以本次调查对象非常分散。结合调查要求和实际情况,本次调查采取了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首先将江苏省上述 4 个县市分为 4 个调查点,然后在每个县市(调查点)分别随机抽 2~5 个乡镇,接着对抽中乡镇的移民进行整群抽样。抽样以户为单位,调查对象主要是移民家庭中的户主或其配偶。调查于 2003 年 9 月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15 位研究生采用入户结构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一共调查了 4 个县市 13 个乡镇的 227 户移民。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的基本情况

基本变量	频数	百分比	基本变量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年龄(岁)		
男	152	67.0	18~35	99	43.6
女	75	33.0	36~50	97	42.7
文化程度			51~	31	13.7
没上过学	16	7.1	迁入时间(年)		
小学	93	40.9	2000	17	7.5
初中	103	45.4	2001	146	64.3
高中及以上	15	6.6	2002	64	28.2

(二) 主要变量的测量

因变量:“边际人”心态。“边际人”是一个相对学术化且比较抽象的术语,对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说可能不太容易被理解,因此本研究尝试采用两种意思相近、但更通俗的表述来测量。一是“人生地不熟”的感觉,二是“外乡人”的感觉。

自变量:共包括 5 个方面。一是社会交往,根据交往对象不同分为与

当地居民的交往和与移民的交往;二是适应情况,包括生产劳动方式的适应、日常生活的适应和语言适应(是否能听懂当地话);三是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四是对目前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的满意度;五是外出打工经历。

此外,本研究还引入几个基本的控制变量,即移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搬迁年限。

二、统计分析结果

在测量“边际人”心态的指标中,“人生地不熟”主要表达了个体对新环境的心理感受,而“外乡人”感觉则是一种没有被当地人认同的心理感受。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移民具有“边际人”心态。接近 80% 的移民对安置地有“人生地不熟”的感觉,接近 90% 的移民有“外乡人”的感觉。不过,移民的“边际人”心态有强弱程度上的差别。有 22.9% 的移民基本没有“人生地不熟”的感觉,42.7% 的移民有一点“人生地不熟”的感觉,还有 34.4% 的移民这种感觉很强烈。至于“外乡人”的感觉,11.0% 的移民基本没有,50.2% 的移民有一点,38.8% 的移民这种感觉很强烈。

这些移民都有着跨文化的经历;都是从重庆市外迁至江苏省的,搬迁过程相似,安置方式也一样;都是政府组织搬迁、分散安置,具有同样的背景,但是移民的“边际人”心态程度却出现了差异。哪些因素导致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民的“边际人”心态出现差异,哪些因素影响“边际人”心态的强弱程度?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将上述两个测量指标转换成一个新的变量,即“边际人”心态,以此作为因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2。

从表 2 可看出,新生成的因子可以解释原变量 74.87% 的方差,既较好地保留了原变量的信息,又达到简化变量的目的。把通过因子分析生成的“边际人”心态因子作为因变量引入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中,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看出,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可以解释 40% 的方差,即引入表 3 中的影响因素可以解释“边际人”心态 40% 的差异原因。整个回归

模型的方差检验值为 11.864,显著水平为 0.00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引入回归模型的影响变量中,除了性别、文化程度、搬迁年限和语言适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

表 2 “边际人”心态因子分析

项 目	因 子
“人生地不熟”的感觉	0.865
“外乡人”的感觉	0.865
特征值	1.497
解释的方差	74.868
因子命名	“边际人”心态

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表 3 “边际人”心态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常数项	1.599	—	外地打工经历(有=1)	-0.310	-0.149**
社会交往			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0.145	-0.167**
与当地居民	-0.267	-0.260***	家庭经济收入满意度	-0.150	-0.146*
与其他移民	0.146	0.140*	性别(男=1)	-0.138	-0.065
适应情况			年龄	1.557E-02	0.150*
生产劳动方式	-0.147	-0.160*	文化程度	3.802E-02	0.039
日常生活	-0.142	-0.148*	搬迁年限	0.109	0.061
语言	-0.156	-0.117	R=0.634 R ² =0.402 F=11.864		

* P<0.05, ** P<0.01, *** P<0.001。

从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对“边际人”心态影响最大的自变量是“与当地居民交往”,移民与当地居民交往越频繁,“边际人”心态越弱。“与其他移民交往”对“边际人”心态也具有显著性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与当地居民交往”的影响方向相反。越是与其他移民交往,“边际人”心态越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对“边际人”心态的影响仅次于“与当地居民交往”,对未来发展越有信心,“边际人”心态越弱。“生产劳动方式适应”和“日常生活适应”两个变量的影响也较显著,生产劳动方式和日常生活适应越好,“边际人”心态越弱。“外出打工经历”对“边际人”心态也具有显著影响,有外出打工经历的移民“边际人”心态弱于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移民。“家庭经济收入满意度”对“边际人”心态也具有一定影响,对目前家庭经济收入越满意,“边际人”心态越弱。最后,年龄越大,“边际人”心态越强。

三、移民“边际人”心态的影响因素

(一) 社会交往对“边际人”心态的影响:文化融合与“贴标签”效应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交往情况是影响“边际人”心态最大的一个方面。移民与当地居民交往越多,其“边际人”心态相对较弱;而与其他移民交往越多,其“边际人”心态相对较强。这说明移民积极参与社会交往会对其“边际人”心态产生重要影响,但交往对象群体不同,影响的效果也不同。“边际人”心态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民面对的是原有文化(即迁出地的文化)和当地文化(即迁入地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个体是文化的载体,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途径。移民可以从交往中学习了

解当地文化,进而理解当地文化,自觉地调节原有文化和当地文化之间的冲突,从而弱化“边际人”心态。而与其他移民的交往,更多的是在原有文化中交流,强化了对原有文化的认同感,相应的也就降低了对当地文化的接纳程度,更容易加深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强化“边际人”心态。

此外,“边际人”心态还受到其他人评价的影响,这里的“其他人”主要指当地居民。也就是说当地居民的印象和评价具有一种“贴标签”效应,别人认为你是“外乡人”,你自己这种“外乡人”的感觉就会更强烈;反之,当地人接纳你,把你当作当地居民看待,你的“外乡人”感觉自然也会弱化。社会交往的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协调和相互接纳的过程。与当地居民交往越多,越容易融入当地居民中去,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可,从而弱化“边际人”的感觉。而与其他移民的交往,虽然可以互相帮助,也可以获得移民朋友的认可,但这不利于和当地居民的融合,容易形成封闭的小群体,从而拉大与当地居民的距离,强化“边际人”心态。

(二) 日常生活适应、劳动生产适应对“边际人”心态的影响:社会适应“三阶段”论

移民的社会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风笑天(2004)指出,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要经历三个不同的层次和方面:日常生活适应、劳动生产适应和心理归属适应。社会适应首先是从日常生活领域开始的,然后是生产劳动和经济发展,最后是包括主观感受、心理融合、社区认同在内的“我群感”、“归属感”的建立。也就是说,移民社会适应过程可分为日常生活适应阶段、劳动生产适应阶段和心理归属适应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适应目标。虽然具体实践过程中三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但每个阶段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这就是社会适应“三阶段”论。

如果说心理归属适应是社会适应过程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那么前两个阶段的适应程度对心理归属适应是否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日常生活适应和生产劳动方式适应对“边际人”心态有着显著影响,日常生活适应程度越高,生产劳动方式适应状况越好,移民的“边际人”心态越弱。“边际人”心态即是对心理归属适应的考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日常生活适应和生产劳动方式适应会对心理归属适应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证实了社会适应过程中,第一阶段(日常生活适应)和第二阶段(生产劳动方式适应)的适应状况对第三阶段(心理归属适应)的适应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除了考察日常生活适应和生产劳动方式适应对“边际人”心态的影响效果,还引入了语言适应变量。本研究之所以专门考察移民语言方面的适应程度是因为语言往往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当地居民”最简单又最有效的手段,人们往往可以通过语音、语调判别其身份。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语言适应程度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本研究并未证实语言对“边际人”心态的显著影响。这可能和移民群体的整体语言适应程度差异不大有关。调查对象搬迁时间最多为3年,最短的只有1年。江苏省地方方言相当复杂,对一般移民来讲,短短几年学会说当地方言实在太难了。调查表明,227位受访者中只有2人(占0.9%)基本可以讲本地话,15%的移民可以说一点,84.1%的移民完全不会说当地话。93.4%的移民和当地居民交流时主要讲普通话。至于“您是否听得懂当地话”,3.1%的移民表示完全听得懂当地话,35.5%的移民听得懂大部分,48.0%的移民能听懂一点,还有15.4%的移民完全听不懂。语言方面的适应能力明显受年龄的影响。调查时不少被访者提到孩子学说当地话很快,而他们自己却很难改变,年老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改变。在回归分析中,年龄变量影响作用显著,因此可能会因为年龄对“边际人”心态的显著影响作用而消减了语言对“边际人”心态的独立影响作用。

(三) “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对“边际人”心态的影响:信心效应

所谓“信心效应”是指信心可以产生积极的自我暗示,激发行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积极投入到行动实践中去。在回归模型中,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是影响移民“边际人”心态的第二重要因素,仅次于“移民与当地人的交往”。这表明信心效应在移民身上产生了显著作用。移民

对未来的发展越有信心,“边际人”心态越弱;反之亦然。一项关于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是影响移民社区归属感最重要的因素,移民对安置区的归属感会随着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的好坏高低而增强或降低(汪燕等,2001)。对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来讲,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可以推动他们积极适应新的环境,克服新旧文化等方面差异带来的冲突影响,从而淡化“边际人”心态。反之,如果对未来发展缺乏信心,持一种悲观态度,会使移民产生抵触情绪,消极对待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甚至夸大冲突带来的影响,从而强化“边际人”心态。

(四) 外出打工经历对“边际人”心态的影响:生命历程视角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人们的生活经历由许多连续的个人机遇所组成,它们构成了一个人不断变换的生活轨迹。在这样的生活轨迹中,较早发生的生活事件对后来的生命历程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形成个人生活轨迹的转折(刘精明,2001)。本研究借助生命历程的视角,主要考察了外出打工经历对边际人心态的影响。

研究表明,外出打工经历对移民的“边际人”心态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外出打工也是一种迁移,一种暂时性的迁移,伴随着这种迁移,他们也会遭遇“边际人”心态,这种心态除了地区文化差异,还有城市和农村文化的差异。孙立平(1995)曾指出农民工是一群无法定位的“边缘人”。因此,那些具有打工经历的移民在三峡迁移以前,就经历过“边际人”心理震荡,现在的“边际人”心态不是完全陌生的,他们有过类似的体验,也可能会有些消解这种心态的经验。而对于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其他移民,第一次遭遇文化的冲突,这种“文化震荡”的影响会更强烈,体现在个体身上就是“边际人”心态可能也会比较强烈。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外出打工经历会增加个体的阅历,拓宽视野,正所谓“见多识广”,这一部分人的思维比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移民相对更开阔,这可能也是外出打工经历会降低“边际人”心态强度的一个原因。

此外,个体对家庭收入的满意度也是影响“边际人”心态强度的一个因素。在当今社会,弱势群体最明显的弱势就是体现在“经济收入”上。经济发展是移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三峡移民工作的最终目标“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立足于移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的逐步提高,强调了经济发展的首要性。对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来讲,最关注的也是经济收入问题。家庭经济收入提高,个体对经济收入满意度增强,相应地可能会加深其对安置地的认同感,从而弱化“边际人”心态。

在引入的控制变量中,只有年龄对“边际人”心态的影响作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大的移民比年龄小的移民更容易产生“边际人”心态。年龄大的移民在旧文化圈生活的时间更长,所受的影响更大,新旧文化的冲突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加激烈。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并未证实搬迁年限对“边际人”心态强弱具有显著性影响。笔者认为这与样本总体的特征有关。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搬迁两年的移民,搬迁三年的移民比例较小。因为2000年是三峡外迁移民的试点时期,当年只有183户、810名三峡移民迁入江苏省大丰市,而2001和2002年才是大量三峡移民迁入的时期,因此搬迁年限的差异在样本特征上体现不明显。

四、小结与讨论

研究表明,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移民普遍存在“边际人”心态。关于移民的“边际人”心态,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移民身上体现出来的“边际人”心态是对新生活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正常心态。它主要源于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冲突。“边际人”心态没有褒贬之意,它包含着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边际人”经历至少两种文化洗礼,可以吸纳多种文化的精华。和当地居

民比起来,三峡移民更容易创新,更能接受新事物,思想更开放。另一方面由于“边际人”跨越两种文化,受着“双重文化系统”的支配,缺乏一种归属感,容易产生迷茫感,形成心理的失范性。但是心理的失范并不一定会转化为行为的失范,所以这就需要一系列防止这种转化的社会机制来积极干预。例如,相关政策制定平等、执行公平;移民和当地居民真正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各级政府组织吸纳更多移民参政议政,提供更多促进移民社会参与的机会等等。

第二,移民的“边际人”心态具有“双重边际性”特点。一是共时态的边际性,即由两种不同的文明相互接触、相互冲突而产生的失范性(章军,1994)。移民的这种边际性是由于三峡迁移直接引起的,迁出地与迁入地文化差异使其产生共时态的“边际人”心态,本文探讨的“边际人”心态主要是从这个维度展开的。二是历时态的边际性,即由一个历史时代向另一个历史时代转型而产生的过渡性(章军,1994)。这种边际性是时代所赋予的,当前整个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生活在其中的人自然会受这种转型的影响,移民也不例外。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民从相对落后的库区迁往相对发达的沿海省份,这种传统到现代的冲击会更加强烈,所以移民的边际性也包括历时态维度的边际特征。这说明移民身上的“边际人”心态相当复杂,因此这种心态的弱化或者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三,“边际人”心态不是孤立存在着,也不是静止存在着,它在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同时,也会对移民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边际人”心态和其他社会因素一起经历着互相影响和互相建构的过程,例如,“边际人”心态与社会交往。研究表明与当地居民交往可以弱化“边际人”心态,与此同时,随着“边际人”心态的减弱,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也会更加深入。这种互相建构的过程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第四,“边际人”心态对移民适应的影响。这是研究移民“边际人”心态的最终目的。通过认识和探讨移民适应过程中“边际人”心态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对移民适应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可以科学地建立起合理的政策和相应的制度,促进移民搬迁与安置工作的正确决策,有效地帮助移民适应新的文化、社会生活,减少适应过程中的障碍,顺利地融入安置地的社会文化中去。

参考文献:

1. 风笑天(2004):《“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社会学研究》,第5期。
2. 汪燕等(2001):《三峡外迁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研究》,《学术季刊》,第2期。
3. 刘精明(2001):《向非农职业流动:农民生活史的一项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4. 孙立平(1995):《农民工:无法定位的边缘人》,《中国农民》,第4期。
5. 章军(1994):《边际人和边际人格》,《社会心理研究》,第4期。
6. Kurt Wolff(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pp. 402-408.
7. Robert E. Park(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3, pp. 881-893.

(责任编辑:胡涛)

Time-Space Evolu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Population Fractal in Shanghai

Liu Miaolong Chen Peng Feng Yongjiu • 51 •

Applying fractal theory, this paper measures and calculates the fractal dimensions (box fractal dimension and correlation fractal dimens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Shanghai and some of it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at the levels of township, town and residential district. The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riving forces for population evolution is analyze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made in establishing Shanghai's new population policies.

Depreciation-based Measurement of Human Capital: Cases of Three Provinces in Yangtse Delta Region

Sun Jingwei • 61 •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cost-accounting-based model of human capital measurement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variant of human capital depreciation, and computes the annual values of human capital of Shanghai, Jiangsu and Zhejiang during the 1990-2002 perio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er capita human capital in these three regions are higher than the country average, and Shanghai enjoys the highest per capita human capital, with Zhejiang and Jiangsu tak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place respectively. By testing the results, the author's estimates are more reasonable and accurate and can better interpret the corresponding economic phenomena than those estimated by conventional method.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ly Affordable Popul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Gorges Area

Wang Bing Huang Dai • 68 •

Under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E-R environmental capability of population model can be a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directly measure the environmentally affordable popul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area. Following the P-E-R model, Three Gorges environmental capability should be analyzed by considering both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 model, the Three Gorges Dam has been constructed at price of environmental capability of population. However, in the long term this project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lic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Marginalized Self-recognition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nts in the Three Gorges Area and Its Determinants

Tang Liping • 75 •

Based on a sampling survey, the inter-provincial migrants in the Three Gorges area who currently live in Jiangsu province are found to be self-recognized as marginalized group.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social communications, social adaptability,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experience of work outside, satisfac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ages, are determinants in forming this self-recognition.

A Review of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alyses in a Gender Perspective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Gao Mengtao • 81 •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empirical 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alysed by mainstream western economists after Gary Becker.

Population Security and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Mu Guangzong • 90 •

This report sums up the experience, lessons and prospects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in Yichang region. The 3+S Promotion Program, which is the guideline and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Yichang, works well in practice. The experience reveal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consists of two steps. The first is how to carry out th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effectively, and the second is how to promote the healthy population dynamics. The first handles issues of childbearing, birth control and dysgenesis while the second handles structural, functional and development-related issues of population. Undoubtedly,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reform should contribute to, not damag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